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中国. 第2辑/刘永佶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6

ISBN 7-81108-215-2

I. 经… II. 刘… III. 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2100 号

经济中国 (第二辑)

主 编 刘永佶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215-2/F·10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经济中国》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永佶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长 王天津 王玉杰 刘永佶 宋才发

李克强 张兴无 张丽君 张建平 杨思远

施正一 谢丽霜 魏小安

主 编 刘永佶

副 主 编 李克强(执行) 张丽君 张建平

编辑部主任 张兴无

编 辑 王玉玲 张冬梅 张兴无 陈 锋

为《经济中国》序

干活吃饭养孩子，是人类生存延续的基本。这是个体的，也是总体的。从个体论，生存很简单；在总体，则错综关系，复杂矛盾。由此构成经济的内容。经济是总体的，也是个体的，如何从总体处理关系，促进个体发展，是经济学的主题。

人以劳动而生而长，生产方式的提升是人类发展的根据。从农业到工业，是生产方式和文明的演进，现代人类正经历此变革。先行者富强，落后者贫弱。曾在农业生产方式领先的中国，因集权官僚制的束缚和小农经济的保守而在工业生产方式上落后。中华民族由此受到欺凌。先进分子倡导革命，变革制度，更新观念，提升素质技能。革命乃经济发展之正道，亦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依靠。一百年来，中国经济由革命导引而发展，但革命远未终结，社会主义制度尚在改革、完善之中。以革命精神指导经济，是中华民族自立进而领先于世的根本。

经济学是工业先进国家提出的，但中国古来就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引进并分析、消化外国经济学说，继承中国

古代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条件。确立劳动者为中国经济主体，概括其经济意识，正视现实矛盾，揭示现象中的本质，得出规律性认识，以此指导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是一个大项目、大任务，需全体中国经济学者共同努力而成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为庞大中国经济学界之一员，开此《经济中国》，以为创建、发展中国经济学辟一园地，与同仁共耕耘。

劉永信

二〇〇五年九月九日

目 录

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对中国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启示..... 刘永佶 (1)

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分析

——宏观效应、核心机制与解决对策..... 白暴力 (19)

三大差距与社会和谐..... 陈永志 钟春洋 (31)

论劳动者素质技能..... 李 嵘 (42)

中国新时期的劳动力供求形势分析

——兼谈深化就业的若干途径和可能的趋势..... 李 文 (55)

论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适应..... 王文长 (77)

论构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据、目的、机制与保障..... 陈 锋 (85)

“工业化”概念新探..... 王玉玲 (100)

从国家竞争优势角度考察劳动力成本

与资源优势 孙 强 (114)

财产税影响住宅价格的理论研究及启示 俞冬来 刘大平 (119)

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之争 毛 晖 (126)

附属账户测度信息产业理论探析 杨西平 赵丽霞 (135)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的“产权”问题 纪坡民 (143)

企业人本管理新论 刘建利 (150)

家族企业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分析 周明生 (160)

国有资产流失途径分析 张鹏飞 李海燕 (172)

论西藏外生金融发展	张志恒	(180)
福建省竞争力分析与科技竞争力评价		
研究	周世举 刘元庆 赵丽霞 林丹萍	(193)
试论名牌战略与西部经济发展	徐则荣	(206)
县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与相关思考	柯美成	(212)
试从《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	赵学增	(223)
马克思关于农村、农业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论述与		
我国农村经济的第二次飞跃	许兴亚	(243)
当前经济理论界对若干热点问题的		
争论	卫兴华 孙咏梅	(256)

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刘永佶

摘要：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的根据在于经济矛盾的国度性，国度性是国家的存在所导致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特殊性的集中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有确立主体性，才真正有了立脚点和着眼点，进而确立主体的观念和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哲学方法的展开，哲学创新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创新和发展的前导。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以其方法对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在经济矛盾的探讨中对主义的贯彻，是所要形成的学说体系的基本观念。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国度性 主体辩证法 中国经济矛盾

在拙著《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的“结束语”中，我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并非摈弃外国人既已做出的成就而另起炉灶，按我们的‘国粹’方式，建一套儒家道家或什么家的经济学体系，更非把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科学概念、术语替以‘之乎者也’，而是在承认和继承这门科学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批判地吸收其他学派的科学成果，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学术方法中的精华，对中国现实的经济矛盾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揭示并论证其中的客观规律，指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建设，充实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实质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揭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①

“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一提法，曾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其理由就是：政治经济学像物理学、数学一样，是世界性的，不可能有什么“中国化”。写

^①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96 页。

出这段文字后，18年间，我对“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也不再满意，但不是认可了反对意见，而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一新思路。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的否定，并写出了《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①。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及该书的写作，不仅在于明确了经济矛盾的国度性和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还在于对政治经济学史及其方法史的进一步探究。在对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为基础，写作《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大纲》的过程中，我更坚信它的合理、应该和必要。

一、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与中国 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是我在政治经济学史和方法史的研究中发现的，它的根据在于经济矛盾的国度性，国度性是国家的存在所导致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特殊性的集中体现。经济矛盾的国度性同时体现着不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矛盾，是在特定国家生存的人的意识和社会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集合。作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认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摆脱其研究主体和对象所同处的国度经济矛盾，因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之一。

迄今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和派别，都是在不同的国家，受其特定的国度经济矛盾制约，并且是对这个矛盾的理论反映。

然而，除早期少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表示过自己的学说有国度性外，大多数人，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都回避、乃至否认自己学说的国度性，宣称自己的学说不仅是世界性的，而且是“纯科学”的，不带阶级和国别的偏见。相对于他们自己信守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说，否认国度性，是最不实证的，是其阶级性和国度性导致的偏见的体现。这种情况在现代美国的“主流派”，即新古典综合派那里表现得相当突出。依恃经济发展所集合的超强军事力而称霸现代世界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固守、强化其国度性，另一方面又支使所雇佣的经济学家否认、掩饰其经济意识的阶级性和国度性，在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的经济学体系中，不仅避开国度、阶级这些范畴，还避开了构成国家的必要的制度、权利。由此，经济只是一个可

^① 该书2004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以用货币计量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非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为主体的经济矛盾。这样的经济学，等于把人体切碎、晒干所形成的拼合图，看起来是那么简单、容易，既没有人与人的对立，也没有国度差异。然而，那种取消了生命的拼图并不能体现人的本质，排除了矛盾，抽去了生命和精神的经济学也不可能说明经济规律。这种故意避开国度性的经济学说，恰是其国度性——美国大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的属性——的表现。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既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矛盾中的国度性，又取决于研究主体的国度性。这两点，不仅在现实中明显地存在着，也被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其方法史所证明。本书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学家，每个人都是从其特定的国度性和阶级性，对特定的国度性经济矛盾的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斯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注重国度性，并反复论说他的研究是以英国国民财富为主，兼及他国及历史上不同国度。历史上的众多经济学家，不论其方法和结论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度性。也正因此，他们的学说和方法才在国度特殊性中包含着、体现着世界一般性。

我们作为生存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是研究的主体，我们所研究的，是我们生存其中的中国经济矛盾。这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和主体性的根据所在。

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具有特殊的国度性。这不仅在于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这个矛盾有深厚、复杂的内容，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以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进行研究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人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矛盾的过程和成果，这是任何外国人所不能替代的。

中国政治经济学，不是只有中国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研究就可以形成的，这只是基本的现实条件。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主动的、主观的研究，要有明确的主体性及由之而生的观念和方法。强调并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关键在于研究者要有清楚意识和目的，并确定主义和主题。在这一点上，体现着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各外国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和联系。后起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然要学习、借鉴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但这不等于说外国人的成果就是一般真理，外国人的方法是唯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我们只能遵循外国人的方法，学习、运用外国人的学说。一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

中国的经济学家都看不到或不敢明白这一点。他们真诚地以为，只要认真学习外国的经济学说，并把它运用于中国，就可以使中国步入“客观经济规律”的正途，由此就会像发达的外国一样发达起来。这种观念今天仍相当强烈，那些自称“主流经济学家”的人，将自己视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派驻中国的代表，像美国大公司的孙公司负责人一样，忠实地执行“老板”的意图，在中国推销其产品。他们是坚决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性的。或许其中也会有人顺便提一下“中国的经济学”，但他们的本意是以美国主流派的观念为观念，以美国主流派的学说为真理或规律，“中国的经济学”不过是将这些真理演绎为符合美国主流派观念的政策而已。这种观念，看似新潮，实则旧路，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视为“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如何理解这些规律、运用这些规律的观念的继续。二者的区别，只在将不同外国（美国或苏联）的经济学视为真理罢了。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有确立主体性，才真正有了落脚点和着眼点，进而确立主体的观念和方法。对外国的经济学说，不是排斥，而是从其国度特殊性中概括世界一般性，吸收其一般性的成分，在中国特殊经济矛盾的研究中，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一般性的理论认识和方法，进而展开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中去。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由生存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从经济矛盾国度性这个层次着眼，但并非只研究这个层次的矛盾，而是通过对这个层次上中国特殊经济矛盾的认识，发现其中包含的一般层次上的矛盾，并与外国经济学中所体现的对一般层次经济矛盾的认识结合起来，形成抽象的观念和概念，再从抽象到具体，全面探讨中国经济各层次的矛盾。

政治经济学是世界性的社会科学，它的世界一般性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也并非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就是世界一般性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一般性就存在于各国度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中，是对国度特殊性的概括。中国是一个主权大国，其经济矛盾具有明显的国度特殊性，必须从中国的主体性出发，揭示中国特殊性经济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对世界一般性经济矛盾的认识，并与外国政治经济学进行交流。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从理论上说，是现实的有阶级意识的中国人，但从实际上看，并不是所有阶级的人都能以自主的主体来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都从各自阶级利益和意

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从而形成了对立的国度经济学说。中国则不具备这个条件，自 20 世纪初以来，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在国内是一股强大的势力，但它将自己的利益系于外国大资本财团，以充当买办为己任，只需以自己传统的官文化来领会、改造外国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不需要，也不可能以主体身份来创立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雇佣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只是研究如何在中国适应、推行美国的主流经济学。中国的自由资本所有者，严格说来，尚未形成其阶级意识，他们或者顺从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或者在观念上接受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但无能，也无力创建中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两千余年传统的小农意识，只是如何适应集权统治，以求生存，但不可能将小农意识集成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改变生存状况的要求，只能体现于接近、接受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的意识，参与社会变革的运动。

因此，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或者说真正能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性的，只有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他们由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以及明确要求改变小农经济，向往工业文明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的农民构成。这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为此，他们具有强烈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经济矛盾的愿望，要求代表他们利益的经济学研究者，将这个群体的个体经济意识概括成为阶级意识，并对中国经济矛盾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形成指导经济制度和体制变革的经济学说。中国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要求的集中体现，又是指导变革和发展的理论依据。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决定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主义，这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只有在劳动社会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形成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要立足于哲学创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哲学方法的具体化，方法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以哲学的创新为前提：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以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为前导；斯密以法国唯物主义和休谟的怀疑论为前提，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系统；马克思以黑格尔辩证法和他本人对辩证法的改造、完善为基础，创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在学习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帝国主

义的理论规定，进而创造性地领导俄国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凯恩斯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为前提，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斯大林及苏联经济学家受教条主义影响，而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步入教条化；毛泽东以他对辩证法的创新提出了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独到见解。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史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大体说来，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哲学方法的展开，哲学创新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创新和发展的前导。但政治经济学方法也不是完全被动地被哲学方法牵着走，它在展开哲学方法，对经济矛盾系统的深入研究中，会遇到许多具体的方法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条件。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有一些是以前哲学方法所涵盖的，也有一些是其所未涵盖的，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不仅从本学科，还要从哲学角度对之进行探讨，少数经济学家具备哲学创新的能力，如马克思，他们可以将哲学创新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具备哲学创新的能力，而是将所遇到的方法问题以各种方式提出、展示给哲学研究，当某个或某些哲学家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就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发哲学创新，为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提供方法上的指导。

政治经济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都是不断发展的，它们的发展，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互相促动的。从逻辑上论，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进展，以哲学方法的创新为前提，同时又是哲学方法进一步创新的基础。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关系，不是医院与病人的关系，不是政治经济学方法上出了问题，去请哲学医治和解决；也不是上级领导与下级职员的关系，不是哲学给政治经济学下达什么指示，要求在方法上做哪些改变。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是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理性思维的系统，它们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居不同层次，其方法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哲学方法具有明显的抽象一般性，但这种抽象一般性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对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乃至社会生活中的方法问题的抽象，即对其中一般性的概括。哲学的创新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上帝旨意和绝对精神，更不是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而是以具体科学和社会生活为基础，对其中的认识和方法问题的概括，并在哲学层面加以探讨和解决。

现代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滞缓时期，其原因，一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美欧等国资本统治的稳固，而处于一种“天下太平”、“高枕

无忧”的状态，虽然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经济学，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却不复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的变化，使垄断资产阶级大大松了一口气，威胁其对人类统治的主要障碍消除了，而国内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也处于一个缓和期。这是自资本产生以来其感觉最好的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不必去揭示经济矛盾，甚至连为经济矛盾的辩护也成为多余。那些原来以社会主义反对资本统治的国家，现在正自觉地实行“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逻辑，而且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局限，不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给垄断资本以挑战，即令有这种挑战，也只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事。于是乎，资本主义经济学成了一种只对经济矛盾表层描述和数量关系的演算，经济学家在自己构设的数学模型中进行推演，其错与对，似乎都与经济生活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绘图的艺术，借助计算机画出各种公式、模型。因资本统治的强大稳固而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雇佣一批经济学家，他们虽然不会对经济的发展提供什么理论，但却可以为政策和经营提供一些帮助。步入“数学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将方法植根于数学，甚至连论证也以数学公式来代替，不仅不会对哲学提出要求和提供发展的条件，连自身方法的特殊性也逐步在淡化。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在方法上的这份“安逸”，正是其没落的表现。当一门科学从方法上将其面对的矛盾都从研究中排除，它的生命也就即将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正处于这样的境地。虽说中国某些经济学家还在起劲地宣扬这种学说，似乎贩卖救国济民的良方，但在其宗主国，它的没落却是不可挽回的。而中国的这些宣传员们，既没有从方法上创新的能力，又因为了利益而向官僚资本献媚，给私有企业老板脸上贴金，但又不能拿出真正有用的招数，而在中国受到冷落，并被美国，甚至香港的同门瞧不起的时候，他们的创新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处于上升时期。虽然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旧的苏联教科书随着“苏联模式”的结束而失去了其现实意义。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载着劳动者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任务，面对资本统治和其他旧势力的压迫，有责任进一步分析现代经济矛盾，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已有的苏联教科书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说显然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为此，必须在劳动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揭示和论证现代

世界经济矛盾，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要以方法的创新为内在条件，而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创新又要立足于哲学方法的创新，即在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卢卡奇等人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辩证法。

哲学创新是时代矛盾演进的要求，而非某个人冥思苦想的结果，更不是随便的标新立异。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主要矛盾，依然是，而且更普遍的是资本统治与劳动解放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不同国度有不同的特殊性，它证明了马克思哲学观念和方法在基本点上的正确。哲学创新，必须承接马克思的基本点，由此出发，研究矛盾的演变，总结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新生力量生成的经验，进而集中探讨现实社会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充实、发展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辩证法。这里，既要对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家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概括，也要对教条主义方法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从现在按历史顺序逆推到马克思，再以马克思的基本哲学观念和辩证法为依据，审视其后一百余年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发表的哲学观念和辩证法，并在总结与之相关的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现其哲学上的问题。通过历史的反思，加深对马克思哲学观念和辩证法的理解，以此为哲学创新的前提和起点。

现代哲学创新的根据，在于对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概括，即从哲学对劳动社会主义基本观念和方法论的规定，这种规定不是单面的，而是与对现代社会矛盾的揭示相统一的。现代劳动者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他们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展，不仅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要求提高社会地位的根据。正是劳动者提高素质技能，提高社会地位，乃至成为社会主体地位的要求，是一百多年来人类进步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势力作为全世界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虽然还处于次要方面，但现代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有意识的、主动的社会势力，社会主义运动激烈地冲击着资本统治和其他旧统治势力，在个别国家甚至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级制度。与之相应，资本统治与其他旧统治势力也在发生变化，它利用其统治地位和握有的权力，占有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和发挥的成果，并据此维系其统治，同时，也不断地变换统治的手法。因此，现代人类社会矛盾呈现许多新特点，哲学创新就是以现代劳动者为主体，对这些新特点在抽象层次上进行概括，形成新的哲学观念和方法论。其

要点，就是否定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承认其对世界物质性，人是物质世界演化的结果，人的认识是大脑的物质活动，以及感性到理性等观点，并以之为前提，确定人的主体性，集中探讨人的本质及人性，规定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及其演化阶段，在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过程中，形成辩证法，其规律是对立统一，并由规律展开若干范畴，构成体系，以导引劳动者的觉悟和解放运动。^①

哲学的创新，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与要求，也是哲学逻辑的必然。它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他科学的发展提供必要前提。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内生外化的系统抽象

中国政治经济学只能以现代中国劳动者为主体，因而是以劳动社会主义为主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对身处其中的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与论证，是主体生命的体现，而非对冷冰冰尸体的解剖。这个过程是有精神的，是在主义指导下的思维过程。它有强烈的主动性，是思想的生成，是理性的创造。但它又是有严格要求的，并非随意的妄想。因此，必须形成自己科学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具体化的内生外化的系统抽象法。

方法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主动的研究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和思维的创造；方法是个体人脑细胞的运用，同时又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思维规律的集中体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是方法发展的过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认真总结这个历史过程，从中吸取一切可以借鉴、启示我们研究的因素，同时更要根据主义进行创造，由此而达到揭示和论证中国经济矛盾的目的。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我做了多年探索，也有一些心得，反思起来，还有一个欠缺，那就是“内省”，即对个人的价值观、利益、意识等的系统思考和规定。虽然这些思考每人都有，而且会反复进行，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所必要的内在条件，但在方法论的探讨中，我却更注重思维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个欠缺必须补上，并要与外在的研究相统一。

只重“客观”，忽略“主观”，是西方人思维的传统。从古希腊哲学家开

^① 相关具体论证，请参见拙著《劳动历史观》和《主体辩证法》，二书均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

始，到基督教，再到近现代哲学，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但对进行认识的人，却基本上是视为个体的认识工具，是以感性和理性来认知对象，其知识是外界（自然、人、“上帝”、“绝对精神”）的反映。很少有将人视为认识的主体，而这个主体也是认识的对象。虽然其心理学、逻辑学很有些成就，但也是将心理、思维作为外在对象进行研究的。这个特点势必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我以前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西方几百年的政治经济学史，因此不免带上这个思维特点。

当我们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仅其对象是中国的经济矛盾，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中国的特点，即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下来的思维方法。其中，“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是两个主要环节。

一个思想者或学者，在对外界事物进行思考的同时，甚或之前，要先明确自己之立命、立意，不断纯净思维，提升认识能力，是内在的条件。对此，先秦思想家已有充分的意识。孔丘说“吾日三省吾身”，孟轲说“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况倡“治气养心之术”，体现着儒家对此的重视。老聃五千言《道德经》，将道与心、物与人相通论，且由此而建一大系统。庄周内外互动、大小相对，道家于内省和系统思维又有建树。庄周还将儒家学术概括为“内圣外王”，后世儒家传人又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中前五个环节规定为“内圣”，后三个层次为“外王”。《大学》中的原文如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①

这八个环节，环环相扣，内外一统，外发于内，内表于外。可谓儒家道统两千余年维系之主线。

^① 《礼记·大学第四十二》。

后佛教传入中土，经儒、道两家学术治之，演变为中国佛教，其精要在禅法。禅法即禅宗的方法，在修、在悟、在静、在净，“直接人心”、“明心见性”等对内省之法大有创进。宋时，三教相融，使中国学术思维再上一层楼。明王守仁之心学与宋理学相呼应，内外一统之系统思维方法，基本形成。可惜明亡后满洲人入主中原，学术停滞后退，而此时欧人却乘重商之舟步入资本制工业文明，政治经济学由其论成，华夏反大落后于斯。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是与农业文明和集权官僚制相适应的，其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显而易见，在这历史的特殊性中也体现着人类思维的一般性。应工业文明和资本雇佣劳动制要求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虽无内省之传统，却在外化上大有成就，一些重要思想家也注意到内省的重要，并就此进行了认真探究，由此也成一思维系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法的探索，承继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

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我称之为内生外化的系统抽象法。“内生”包含内省，更有发展的主动性之意；“外化”包括外向，但比外向更注重主动性和目的性，是内生发展之体现。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价值观思考。这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立命之自省。我为什么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谋衣谋食养身，还是将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制约着研究者的思维和努力程度，并影响其对所研究问题的判断。为此，一个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反复的思考，坚定意志，明确方向。研究者是思维的主体，是有目的有追求的，不是思维的工具。其思维活动，只有与其价值观统一起来，才有方向，即明确出发点和归结点，并由价值观制约其研究。也只有将研究活动与自己的“命”——价值观的追求统一起来，才能内省外化地系统思维。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斯密和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马克思，也都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研究的。

2. 主体意识概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是将自己的价值观与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统一起来的。也就是说，立命与立意是合而为一的。只有代表了群体利益，才能得到群体意识的认可，价值才能实现；也只有概括了群体意识，才能代表群体利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研究者是这个主体中的一员，是以主体的意识来导引研究的，为